以国际视野加快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

□ 王 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不仅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而且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因此,构建阐释中国共产党历史、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知识体系,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机理,内在地要求运用世界眼光审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史和伟大成就。唯有从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事实基础和人类文明的发展高度提炼中共党史党建学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才能够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意义,才能够说明白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贡献。

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坚持国际视野

以国际视野加快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本质上是通过方法论的革新,构建新的解释概念和理论阐释体系。将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历史置于源远流长的人类文明演进与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变迁脉络中,不仅能够拓展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资料范围与分析维度,更能揭示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独特贡献,为国际社会全面、准确地认识中国共产党提供知识架构和理论方法。

推动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知识生产与理论创新。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是由一系列立足于我国自身历史和现实而形成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所构成的,这些知识生发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实践。拓展国际视野,能够更好彰显这些知识所完整涵盖的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世界意义。“新民主主义”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一个标识性概念,“新”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中国革命属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一世界历史条件使得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对象和革命前途均发生了变化,从而产生了不同于以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革命任务、革命方式。知识的生成有其自身规律,需要在交流互鉴中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在面向世界进行知识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要要不断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并将其转化为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资源,避免因封闭性研究而产生资料单一、概念模糊、范畴混乱等问题。例如,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林迈可的《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等著作,这些他者视角的史料有助于构建更加完整、立体的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

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话语权与全球影响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可能”等的关注度持续上升。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坚持国际视野,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根本性质、领导方式、组织体系等角度对百余年历史成就进行“解码”,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中所蕴含的道理学理智理充分显现出来,从而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制度的理解与认同。例如,贫困治理是长期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全球性难题,中国共产党通过发挥集中统一领导和举国体制优势,将政治动员、组织整合与基层治理有机结合,形成了精准高效的扶贫脱贫政策体系,创造了人类脱贫史上的奇迹。以国际视野对脱贫攻坚实践中的“坚持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等经验进行学理分析和理论阐释,能够提高中国共产党对消除全球贫困这一世界性议题的话语权。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变革回应经济全球化浪潮,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逻辑和主要特征,努力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等超越国界的时代课题,把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紧密结合,在实践中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全过程人民民主”等重要理论成果,为全球治理提供了超越“西方中心论”的文明方案。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在不依附于西方国家的前提下探索出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方案。以国际视野加快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能够在比较和对话中从文明维度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理论阐释,在解释中国发展道路的同时回答好“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

以国际视野加快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原则

以国际视野加快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要根植本国土壤,又要置身世界文明对话的大格局中,在交流互鉴中坚定理论自信、坚守中国立场,形成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理论。

坚持政治性与学术性相统一。哲学社会科学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关于中国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讨论本身就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如果在研究中刻意回避或弱化政治属性,不仅会割裂研究对象的真实存在形态,也会导致理论解释的失真与空洞。在国际视野下坚持政治性,就是在研究立场、研究方向和基本原则上与党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始终保持高度一致,在议题选择和问题设置上始终围绕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重大时代课题,从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历史贡献和实践创造等方面展开研究。以国际视野加快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遵循科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比如,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的理论阐释,不能仅仅停留在国情说明层面,而应从国际视野出发,通过系统的概念阐源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所处历史阶段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的内在张力,是人类社会发展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只有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尊重客观历史事实基础上,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严密的论证逻辑对党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学理化阐释,才能得出美美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研究结论。

坚持实践性与理论性相统一。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从源头上摆脱“学徒状态”,就需要在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提炼规律性认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以国际视野考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与世界意义,将中国人民进行的十四年抗战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国际秩序演变的宏阔背景中加以研究,相关成果在理论层面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和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作用。理论来源于实践,并能够引领实践前进的方向。以国际视野加快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目的在于通过理论构建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上升为具有国际解释力的理论。例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内文化建设和参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提出了文化主体性理论,提供了关于文明多样性等多个方面的解释框架,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理论遵循。

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围绕主题所形成的一系列理论、制度、路线、方针等构成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术范畴。因此,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奋斗历史进行概念凝练和理论创造。民族性与世界性是相辅相成的,民族性是世界性的基础,不同民族基于自身特殊实践所形成的文明形态和知识体系共同构成世界知识体系的丰富图景。当今时代,“中国之问”与“世界之问”相互交织,只有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实践置于国际视野中,围绕人类普遍关切的问题作出理论阐释、进行理论建构,才能更加凸显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独特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就要以自主知识体系发展观照全人类,以海外知识资源服务本土理论创新,使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在开放中发展、在交流中前进。

以国际视野加快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要求

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目的在于服务以中国式现代化金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以国际视野加快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夯实理论基础、搭建知识框架、创设研究方法,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面向世界凝练标识性概念。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往往使用西方学术概念阐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和成就,使得中国经验和发展逻辑蒙蔽于这些概念语境之下,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西方的话语霸权。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要以国际视野提出具有原创性、能够回应时代问题、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概念,以学术的、系统的、规范的话语阐释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伟大成就和经验规律。“人民至上”“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等概念话语来源于党的建设实践,能够将中共党史党建学从西方既有概念范畴中“解放”出来。同时,凝练标识性概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避免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和规范,使之既能深刻阐释中国经验,又具备国际影响力。

夯实中共党史党建学基本理论基础。稳固坚实的理论根基是中共党史党建学在多元理论体系竞争中保持独立性与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夯实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基本理论根基,需要构建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理论体系。第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从本质上回答“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问题,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根本宗旨与目标使命等本体问题,并内在地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确保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些理论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政党的根本差异,是中共党史党建学保持理论主体性的根本前提。第二,党的领导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及新时代党在各领域形成的创新理论成果等,是在回应现代化道路之争、治理模式之争等关乎人类发展前途的问题中逐步形成的,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等,能够科学阐释“中国共产党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的历史逻辑,跳出西方史学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阐释窠臼。按照上述逻辑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理论体系,有助于打破以往党史研究与党建研究之间的壁垒,形成结构清晰、层级合理、内在贯通的理论框架,使中共党史党建学能够在纵向历史演进与横向国际比较中进一步确立学科主体性。

在国际交流中增强批判性思维。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主体性集中体现为由研究内容、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这三个基本要素所构成的学科结构,是对“研究什么”“为什么研究”“怎样研究”的系统回答。在研究内容上,中共党史党建学以中国共产党历史、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核心,从整体上把握党的发展历史、行动逻辑与现实形态;在研究意义上,中共党史党建学明确以资政育人、服务党和国家事业为根本指向,依规辨明的时代价值与现实关怀;在研究方法上,中共党史党建学坚持唯物史观的根本指导,确立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形成经实践检验行之有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与叙事工具,如革命史叙事、现代化叙事、民族复兴叙事等,并辅以多样化的具体研究方法。在明确学科主体性的前提下,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就需要根据自身发展情况,以国际视野辩证地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研究理论、方法、观点以及相关资料。例如,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海外学者往往将“政党”这一概念限定在政党竞争和党际关系中,难以解释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党所进行的国家治理实践,因此在借鉴其跨国、跨政治体系的比较分析方法时,就要以中国实际国情将政党重新界定为统合国家、社会与市场的治理主体。这种批判性的吸收借鉴是形成成熟、自信、开放的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础,让方法为我所用,更好地解释中国实践、支撑理论发展。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

党史钩沉

井冈山时期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 邱 明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将新闻舆论工作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用简便易行的新闻传播手段来宣传发动群众,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了新闻事业,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推动革命斗争深入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初期,为了消除国民党反动派污蔑丑化的不利影响,向群众传播党的主张,1928年10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提出“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版,第192页)的著名论断。随着工农武装割据逐步展开,我们党创造性开展新闻舆论工作,党的新闻事业在早期红军宣传活动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

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传播党的政策主张,广泛宣传发动群众。为了做好群众工作,毛泽东提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79页)是红军的重大任务。这一时期颁布了《通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井冈山土地法》《各商人及知识分子》等文件,用张贴壁报等形式向群众广为宣传。根据地早期印刷品以石印为主,1929年1月,毛泽东亲自起草《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宣传党和红军的宗旨与各项基本政策,请知“地主回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等。布告为四方体,读起来朗朗上口,浅显易懂,沿途张贴,被广大群众了解和接受,扩大了红军影响。3月,红军攻克福建长汀,发现了可以铅印的印刷所。从此,红四军印品日渐丰富,发展到包括小报、画报、画册、通俗小册子和刊物等各类报刊。为了让战士们及时了解国内外形势,毛泽东每次一营到报纸,便“亲自动手编成新闻简讯,自己刻蜡版,自己校对,然后印好发下去,使同志们了解时局变化,耳目不致闭塞”(《红色号角: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同时,我们党在宣传中经常辩以史如口播化和易于传播的标语。受红军报刊和标语影响,许多地方群众说:“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1页)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了创办“党报”与“政治简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95页)等举措,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地方各级苏维埃、各界民众团体普遍创办《时事简报》,《时事简报》是一种手抄大张壁报,一般每周编写并张贴,内容是报道当地群众斗争、红军工作和国内外政治消息。《时事简报》很快普及为工农群众有得懂、喜欢读的通俗报纸,改变了农村根据地消息不通、群众见闻闭塞的状况。有一次,红军攻占大余县城,将《时事简报》张贴在大木桥的亭子上,当地群众纷纷前来观看,“好些人眼睛望着报,口里照着念,一座桥上充满了欢跃的空气”(《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61页)。

深入总结根据地建设经验和开展党内思想教育。《前委通讯》(特委通讯)等党内机关刊物创立,毛泽东亲自为刊物撰写文章,向党内进行思想教育。红四军王力持战赣南闽西,前委编发了《前委通讯》,作为传达会议精神的内部刊物。这份党刊虽然期数少,但作为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和红四军发展的史料,具有重要历史意义。1929年4月,红四军内部围绕建党建军重大原则和方式方法问题展开了争论。6月中旬,前委为了统一认识安排红四军领导人以写文章的方式,总结根据地创建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巡视闽赣苏区。文章集中刊登在第三期《前委通讯》,下发给全军指战员讨论,后又将《前委通讯》等材料上报中央,让中央及时准确了解红四军内部真实的思想状况。中央先后起草了“八月指示”和“九月来信”,最终促成了古田会议胜利召开。1930年1月,毛泽东利用战斗间隙写了一封长信,即后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后以“党内通讯”(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的形式,印发给红四军党内领导同志传阅。党刊忠实记录了井冈山道路的艰辛探索历程,及时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的经验,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将井冈山斗争经验推向全国。井冈山时期,党中央始终关注红军发展,在党刊《中央政治通讯》《布尔塞维克》《红旗》上刊载有关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等文章,并对红军行动进行指导。1927年12月,党中央在《中央政治通讯》第16期刊载了《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转军中全体同志的信》,指示朱德部队前往湘南准备基础,争取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部队联络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54页)。在创建根据地过程中,红军胜利和苏维埃建设是报刊关注的重点。1928年1月16日,《布尔塞维克》第14期刊载《湘鄂赣川四省农民暴动之新发展》,报道了工农革命军占领茶陵县城的战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66页)。2月21日,《中央政治通讯》第27期刊载《湖南政治任务及工作方针决议案》,要求省委的政治机关报,“最好是日刊,至少是三日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81页),以指导根据地革命斗争。我们党在茶陵、通川、宁冈、永新等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4月底朱毛会师,党中央在《中央政治通讯》第30期刊载《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就“建立红军问题”“党的军事组织与苏维埃的指挥系统”“军队中党的组织及政治工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99-101页)等问题作出安排。《布尔塞维克》第23期刊载《一个月来各方军事形势》,报道红四军取得五斗江大捷和一打永新、二打永新的情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151页)。《布尔塞维克》第25期刊载《湖南湘东革命势力之扩展》,报道红四军三打永新、出征湘南和宁冈、永新插牌分田的情况,特别提到分到土地的井冈山农民真心拥护苏维埃政府,有的农民说:“共产党真万岁才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163页)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开创了新局面。4月13日,《红旗》第17、18期合刊发表《朱毛红军与闽赣农民暴动之发展》,介绍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及汀州大捷的战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303页)。6月29日,《红旗》第27期以红四军士兵来信的方式,分析红军胜利的原因:“我们红军是有主义的军队,有政治训练的军队,我们不仅懂得怎样打仗,特别要懂得为什么要打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327页),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揭示了人民军队与旧式军队的本质不同。1929年八九月间,陈毅专程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期间撰写了五份书面报告,全面客观地总结了红四军的经验。中央负责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十分重视,在1930年1月15日《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刊发陈毅撰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执政的报告》,并亲自撰写“编者按”:“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都是在中国‘割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357页)借助多种载体和形式,井冈山根据地的宝贵经验被推广向全国苏区,对革命道路的探索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

论点摘编

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实践前景

许振江、杨明伟在《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长期实践中,牢牢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积累了一系列领导意识形态工作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丰富经验。总结并运用好这些宝贵经验,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文化领导权理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履行好新时代文化使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新时代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必须进一步巩固并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夯实党的时代引领力。同时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以深化红色文化研究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若干思考

王炳林在《长江文化研究》2026年第2期撰文指出,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深化红色文化研究是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发展的迫切要求。以深化红色文化研究推进党史党建研究,要坚持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善于运用跨学科等研究方法。红色文化包含红色物质文化、红色行为文化、红色制度文化和红色精神文化,不同层面的文化形态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统一的整体文化形态,每种文化形态又各具特色,呈现不同的定位和功能。深入探讨各种红色文化形态在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科中的作用,对于实现红色文化研究与党史党建研究的良性互动、相互成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党史

理论部主办

电话:010-67078549